

跨文化交往:中国价值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张三元

(武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跨文化交往是一个“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统一的过程,其实质是文明交流互鉴。任何一种价值观,都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创新发展的。中国价值的创新发展同样以跨文化交往为必要前提。在跨文化交往中,中国价值紧跟时代步伐,守正创新,不断演绎着“守”与“变”的辩证法,形成了中国价值现代化的基本逻辑:人的主体性建构和普遍交往的形成,为价值观创新发展提供了前提;在跨文化交往中,中国价值守正创新,不断创造新的传统;跨文化交往推动了中国价值的形成,使之汇聚了人类文明史上几乎所有价值观念的优点,因而具有独特优势;在新时代,只有坚持跨文化交往、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以价值观自觉为前提,以日常生活为基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依归,才能不断推动中国价值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中国价值;跨文化交往;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交流互鉴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6.008

跨文化和跨文化传播构成了跨文化交往的基本样态。任何一种文化的跨文化行动,都是在跨文化和跨文化传播的辩证统一中进行的。跨文化交往是一个“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统一的过程,其实质是文明交流互鉴。任何一种价值观,都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创新发展的。中国文化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创新发展,中国价值亦不例外。中国价值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主要是指中华民族优秀价值传统,后者则主要是指在当代中国居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包括“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1〕}等内容,具体而言,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文所讲的中国价值主要是指后者,但又不局限于后者,因为后者内含于前者之中,是前者发展的新阶段、新境界。赵汀阳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变在”为方法论的文明,一经产生便把外来文化看成自我文化变化、发展的契机。^{〔2〕}中国文化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常新自新,由此所孕育和滋养的中国价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跨文化交往的实践中,紧跟时代步伐,守正创新,不断演绎着“守”与“变”的辩证法,形成了中国价值现代化的基本逻辑。

作者简介:张三元,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价值的跨文化传播”(18AKS004)的阶段性成果。

一、中国价值在跨文化交往中创新发展的理论自觉

价值观创新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价值观是一种观念,是人们关于价值标准、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的理论表达,它强调理论的发展,但更重视人的价值观塑造和践行。只有在人的价值观塑造和践行过程中,价值观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得以彰显。中国价值的创新发展,不仅是中国价值观念的创新发展,更是中国价值对人的不断塑造,是人的现实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及其实践是中国价值的主体和现实展开,当然也是中国价值创新发展的主体及其基本道路。那么,中国价值创新发展何以必要、何以可能?或者说,在跨文化活动中,中国价值何以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实现统一的主体性建构呢?

价值观是一个关系范畴,是主体对客体之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的判断和选择,是一个主体性的观念,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主体既可以是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群体、企业,也可以是个体,但归根结底是“现实的个人”。在唯物史观中,这一思想主要通过两个基本维度呈现出来。

一是不同的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和意义有不同的判断和选择,因而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主体的价值观之所以不同,虽然有客体复杂性的因素,但主要是基于主体自身诸如兴趣、爱好、知识水平以及需要等特点的发展状况。由于主体的认识以及总体能力的变化,特别是价值观的变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同一事物以及不同事物,同一主体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也大不相同。因此,历史地看,在某种程度上,价值观表征着主体的发展程度。人的发展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人的价值观不断塑造的过程,或者说,是价值观不断塑造人的过程。

二是社会历史观和主体价值观的相互彰显和高度统一。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观的核心内容。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独特而伟大的贡献,就是开辟了一条与“观念的历史叙述”完全不同的“现实的历史叙述”^[3]的道路,其根本特征在于社会历史观和主体价值观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恩格斯将其称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4]展陈出唯物史观的核心维度——“现实的人”或“现实的个人”。在谈到唯物史观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实践”或“物质生产”,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实践是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如果忽略了“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这些根本因素,是不可能进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实践”或“物质生产”之于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认为生活是“人类生存”和“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创造历史”的现实基础,而生活又以“物质生产”的劳动实践为根基。离开了“物质生产”,人们的吃喝住穿得不到保证,生存就是一个问题,“创造历史”和发展自身也就是一个伪命题。唯物史观正是在“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5]的基础上创立的。

另一方面,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6]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总是通过追求自己的目的来创造历史。作为历史主体,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人的思想、目的及其活动,都是关键因素,因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7]实际上,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主体或历史创造者。人的思想、目的当然体现了人的价值理想,而人的活动则是通达这种价值理想的现实道路。因此,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价值观发展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当然,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人的价值观念根源于社会实践。正如社会意识根源于但又相对独立于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一样,人的价值观又对社会实践即人们生产什么以及怎样生产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反作用,甚至有时起决定作用。这样,社会进步和人的价值观变革的辩证图景便清

晰地展现出来:社会进步决定人的价值观并成为其创新变革的动力,而人的价值观又对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并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和方向引领。这样,人的价值观不断创新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便日益凸显出来。

关于中国价值创新发展何以可能的问题,可以在唯物史观中得到深入而透彻的理解。概括起来,也有两个基本的方面:其一,社会实践及其造成的社会进步既是价值观创新发展的动力与证明,也是实现价值观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实践永无止境,价值观创新也永无止境。其二,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社会存在也在不断地改变自身的存在状态,其重要表现是人的普遍交往的形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的交往视为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并反复强调“同别人的实际交往”,把人与人之间的“实际交往”看作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享受的直接表现和确证。^[8]在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讨论了交往问题,指明了交往发展的必然趋势,即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必然建立起“人们的普遍交往”,普遍交往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9]而“普遍的个人”的形成使“全面发展的人”成为可能。普遍交往不仅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也给人类文明发展创造了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的传播、积累和创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交往来完成的,“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在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10]因而,“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11]在交往的内容上,既有经济交往、政治交往,也有文化交往。事实上,从来没有纯粹的经济交往和政治交往,经济交往和政治交往总是和文化交往交织在一起,甚至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普遍交往使民族的、地域的文化日益成为世界的文化。所谓世界的文化,不是指一种世界文化,而是指民族的、地域的文化不同程度地走向世界而与多样性文化交流互鉴。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日益普遍而全面,并随着世界历史前行的脚步而不断全球化,形成了全球性交往,而且,文化交往越来越成为社会交往的基本领域,跨文化交往越来越成为文化交往的基本样态。实质上,“文化是一组共同的信念、价值观和动机”,“也是一组共享的看法和认识。价值观和信念会影响这些共享的看法和认识”。^[12]在人们的看法、认识、信念、动机当中,价值观无疑是最深层次的东西,文化交往实际上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交往,价值观交往是文化交往的核心。就民族、国家这一社会共同体而言,核心价值观是在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交往中形成和发展的:于内,核心价值观为社会共同体提供共识基础,因而需要具有强大的包容能力,不断地从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吸取养分,实现包容性发展,形成一个自洽的话语系统;于外,核心价值观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社会,是共同体,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理想,并引领这个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铸牢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意识,就必须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展开交流互鉴,在塑造对方的同时也不断地塑造自身,从而引领这个民族、国家不断前行。

二、中国价值在跨文化交往中创新发展的传统根基

把握一个事物的性质、趋势和未来走向,首先要弄清楚它是从哪里来的。对待中国价值也是如此。中国价值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其根深深地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绵延至今且仍然充满生机活力,重要原因在于其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并且能吐故纳新。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中华民族并不是只有一个源头,而是有多个源

头,是九九归一、多元一体,“在心理上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在地理上始终存在一个共同的‘中原’,在政治上必须承认一个共同的‘中央’”,^[13]异彩纷呈的文化在这个舞台上汇聚、比较、竞争、融合,从而形成了一个“共同文化”。由于其海纳百川、终归一统的基本特质,这个文化是一种“大河文化”,“中华文化的这种历史特点,决定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兼容性,也决定中华文化的多元统一性”。^[14]这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也是其显著优势。

与“大河文化”相适应,或者说,之所以会产生“大河文化”,还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一直存在着“尚学”的优良传统。“尚学”即崇尚学问,亦即爱学、勤学、善学之意,这是品质上的规定。从学习方式上讲,“尚学”不仅包括向书本学、向历史学、向实践学,也包括不同观点、思想、学说甚至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交流、交锋、互学、互鉴。孔子“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观点,精准地诠释了“尚学”的核心要义或根本价值取向。由此不难看出,“尚学”既包括知识的学习、能力的提高,也包含着德性的养成即“德化”,倡导人们通过学习,不断完善自己,由内圣而外王,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因此,文化交流互鉴是“尚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孔子的“游学”就是“尚学”的典型例证。

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是在与世界上不同价值观经常而普遍的交流互鉴中获得生机与活力的,有着强烈的“尚学”精神。当然,这种“不同价值观”是相对的,既包括体系内部的不同价值观,也包括体系外部的不同价值观,试图把两者完全区别开来,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两者呈现出错综复杂、犬牙交错、相互交融的局面。因此,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与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交流互鉴也就呈现出一幅极为复杂的图景。在总体上,这种交流互鉴主要体现为三个维度,即“礼失而求诸野”“礼失而求诸夷”“礼失而求诸史”。“礼”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涵义,但在根本上,它主要是指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伦理规范、道德规范即价值规范。因而,这三条路径都展现出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通过交流、互鉴、融合而实现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其中,“礼失而求诸史”是指从历史和传统典籍中获得价值创新发展的思想资源,是“今”与“古”的对话,在严格的意义上不属于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交流互鉴,而是同一种价值观的传承与发展。“礼失而求诸野”“礼失而求诸夷”则是通过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交流互鉴获得价值观包容性、融合性发展的基本范式或思维模式。

“礼失而求诸野”中的“野”与“朝”相对应,泛指民间、民众或非正统。由于专制体制的严酷,虽然传统社会中基本不存在“朝”“野”对话,但不同价值观的相互激荡、相互融合,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形成意义重大。最具典型意义的当数“百家争鸣”。“诸子百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而是通过“争鸣”达成共识。虽然“诸子百家”中学说林立、异见纷呈,甚至有相互攻讦的现象,但在“百家争鸣”中最终形成独特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只有四大家,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这四大家在政治思想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各有主张、互较长短,既自成一家,又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融合发展,彼此独立而又交流互鉴是其共生共荣的基本样态,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尚学”精神。儒家的“三人行,必有我师”、道家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墨家的“士虽有学,而行为本”、法家的“圣人不可期修古,不法常可”,都体现了一种“尚学”精神,即把不同价值观的交流互鉴看成极为正常的事情。这种“尚学”精神,表明他们的价值观虽有不同,但存在着相通乃至融通的可能与趋势。正是这种交流互鉴,促进了儒、道、墨、法的融合。在某种意义上,儒家最终被定为一尊实际上是各种价值观念相互交锋、交汇和融合的结果。即是说,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是“诸子百家”特别是儒、道、墨、法交流融通的证明,甚至其中还融合了佛教的要义精华。

“礼失而求诸夷”中的“夷”是与“夏”相对应的,既是一个专有名词,也可以统称一切不同民族、国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存在着“夷夏之别”。这里的“夷”是一个专有名词:中原地区统称为“中国”,

之外的地区则统称为“夷狄”。“夷夏之别”体现在诸多方面,但根本标志是风俗习惯、礼乐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在当时,“中国”被视为最高的文化场域,是道德教化之地。但实际上,“夷”并非“外邦”,而是一直居于中国文化体系之内的地方,其文化属于“大河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夷狄之交”并非外交,而是内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并非“中国”之价值观,而是“中国”和“夷狄”价值观交流、互鉴、融合的结果,是“大河文化”的价值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直居于主体地位,既可以“以夏变夷”,也可以“以夷变夏”,这种态度既充分显示了“中国”价值自信,又体现“中国”价值的开放与包容。

“夷”也泛指“外邦”,即“西夷”,亦即“大河文化”体系以外的一切文化。近代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的“以夷制夷”的“夷”,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因而,“夷狄之交”不仅是内交,也是外交。在这个意义上,“礼失而求诸夷”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发生了,尽管主要不是“求”,而是“播撒”,但确实起到了价值观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作用。无论是玄奘西游、郑和下西洋,还是佛教东来、利玛窦传教,都彰显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河气象”:既海纳百川,又协和万邦,以“天下一家”的开放胸襟吞吐吸纳各种文化的有益成分。但由于中国所能接触到的“域外文化”,除佛教文化外,基本上是中国主体文化的衍生,难以与“中国”的先进文化相抗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中国文化的盲目自信以及自我封闭状况。到了近代,形势发生了逆转,西方文化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理性和市场理性使传统的中国价值理性不堪一击,中国人盲目自大的心态被坚船利炮所击碎,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便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礼失而求诸夷”发生在近代。这个时候是真的“求”,是落伍之后对先进文明的学习借鉴。尽管这个过程是被动的,但确实促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传入到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更明确地引进了西方的价值观——“德先生”和“赛先生”,从而开启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现代转型的序幕。

也可以将“礼失而求诸夷”理解为“礼失而求诸野”,这不是一个错误,而是历史的真相:连同“礼失而求诸史”,它们之间并不像楚河汉界一样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构成了一条统一的基本道路。正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经历了三次大的整合:第一次整合发生在西汉时期,伴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建立,儒、道、墨、法、佛等诸家价值体系被整合为以君主为核心、以儒家为主体、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统一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第二次整合发生在魏晋到宋明时期,儒道结合,弘扬佛教,从而儒释道并举、“万善同归”——儒家的价值观念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重建了“天理”价值体系;第三次整合则发生在明末清初到近代时期,西方价值观中的自由、民主、平等、民权等思想引入并嵌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之中,构建了从“民本”到“民权”、再到“民主”的价值体系,从而实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现代性转向。^[15]前两次整合主要发生在“大河文化”内部,是同源异质价值观之间的交流、互鉴、整合,后一次整合则发生在“大河文化”外部,是异源异质价值观之间的交流、交锋、借鉴。可以说,每一次整合都比前一次深刻,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呈现出敏锐而丰赡的“大河气象”。

三、中国价值在跨文化交往中创新发展的现实基础

中国价值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这是基本的方面,是“大河文化”的基本“流域”。这个“流域”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中国价值在“奔流”的过程中,不断地开源纳流,借鉴吸收世界上一切文化价值观的合理因素,犹如长江,从源头到出海口是一条奔腾不息的主流,但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支流或水滴汇入其中,从而形成了一条愈行愈宽、浩浩荡荡的河流。这

不仅是历史的澄明,也是现实的观照。中国价值的独特优势不仅在于它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而且经过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淬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还在于汇聚了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上几乎所有价值观念的优点。这是中国价值形成的现实道路。具体来讲,这条道路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

一是中国价值的奠基时期(1921—1949年),即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时期。这一时期价值观念交流互鉴的显著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初步中国化。中国价值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

明末清初以降,西方思想不断输入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从最初的学术思想到稍后的政治思想,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和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与道路。但这种比较也不可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因为它“主要不是中西或东西的对比,而是封建社会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对比;比的主要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而不是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16]因而,它存在着一种时代差,是不同时代的文化比较。如果用这种方法比较,中国就不是落后西方一点点了,而是落后一个时代的问题。显然,想单纯地通过输入西方的思想来重建学术和政治,是不可能解决这个“时代差”问题的。于是,从学术、政治层面深入到伦理层面认识、反思中西方文化比较,便成为一些先进分子的必然选择。1916年,陈独秀就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7]伦理即道德,亦即价值观。与西方现代价值观相比,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显然,只有进行价值观革命,才能推动和引领中国迎头赶上并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价值观革命,因为它引进了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等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从而开启了中国价值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是欧洲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其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在严格的意义上,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一种西方文化,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西方文化的超越,它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批判对象、以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价值旨归,体现的不是西方的价值观,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理想。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8]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中西文化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是引领中国走向光明与未来的正确理论。毛泽东曾经谈到,影响他一生的著作主要有三本,其中就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于1920年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实际上,《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正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准备,因此,《共产党宣言》中的价值理想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从而开启了中国价值传统的新传统:立足于中国价值传统,借鉴吸收西方的价值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以社会主义为根本方向,以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为根本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坚守初心和使命,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时刻。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中华民族新价值观的过程。

二是中国价值的探索时期(1949—2012年),即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这一时期价值观念交流互鉴的显著标志,是我们在中西文化比较中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改革开放精神,确立了“共同富裕”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想。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无疑是中国价值的奠基者和初步探索者。尽管

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概念,但在其思想中深蕴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19]这个价值理想是立足于实践基础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结果,是“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20]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价值理想一直是激励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动力。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价值的全新探索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价值确立了两个时代性的标杆,即“共同富裕”和“以人为本”。如果说“共同富裕”是中国价值的初步建构,那么,“以人为本”则是中国价值内涵的崭新拓展。

对国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借鉴吸收是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至于如何借鉴吸收,邓小平在1977年提出了“一用二批三改四创”^[21]的模式,实际上解决了“借鉴什么”和“怎样借鉴”的问题。正是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邓小平以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为重要参照,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在资本统治中,资本以增殖自身为目标,而资本增殖虽然是“现代的灾难”的根源,但它又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与资本主义相比,邓小平提出了怎样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一历史性课题,并将目光聚焦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按照唯物史观的致思逻辑,社会主义应该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其基本特征是“共同富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不能以贫穷为底色,而必须展现出充满活力、蓬勃向上的社会生产力,以“共同富裕”为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在这里,发展生产力只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价值理想。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引领下,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在“富起来”的路上,通过对传统发展观、西方社会发展观局限性的考察,在进入新千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以人为本是一种科学的价值观,它不仅从根本上超越了以物为本的资本逻辑,还展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样态。实际上,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也是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上:一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二是对西方以物为本价值观的扬弃;三是对西方以人权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资源的借鉴与利用。当然,还有一个维度,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伟大理想,这是根本的维度。以人为本价值观念的提出,标志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初步形成。

三是中国价值的形成时期(2012年至今),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的莅临,开启了中国价值形成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中外核心价值观交流互鉴的主要标志,是中国价值开始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主要推动和引导因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展示出中国价值传统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境界。

新时代不仅是一个历史方位,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实际上,价值取向决定着历史方位。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是由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所决定的,因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时代精神精华的高度凝结,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最持久、最深沉、最稳定的力量。因而,新时代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又提出了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基本内容的中国梦。虽然两者在表述形式上略有差别,但基本内容及其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中国梦是一种价值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象表达,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中国梦的核心内容和方向引领。在这样的一个总体性建构中,以人民为中心居于核心地位,是根本的价值取向,统领一切工作。

中国价值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从不拒绝人类一切价值观中的合理因素,也决不把自己看作仅属于中国的私有财产,从而体现出不同文明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中国价值海纳百川,借鉴吸收了人类一切价值观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借鉴吸收了西方价值观的精华,使之成为自身守正创新的重要条件。我们反对西方的“普世价值”,但从拒绝西方价值观中合理的东西。以科学、民主、自由、法制、人权为主要内容的西方价值观,曾在人类历史上有过非常伟大的文明意义,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内容,而不是西方独自创造的私有财产,当然应该成为中国价值创新发展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中国价值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属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共有,而且,只有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舞台上,进一步借鉴和吸收一切有益的营养,中国价值才能获得更具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因此,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交流互鉴,是中国价值的必然选择和应有姿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实际上已经使中国价值成为世界上不同价值观的交汇点,从而为不断形塑自己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四、中国价值在跨文化交往中创新发展的实践走向

实践性是中国价值的根本特性,它以“改变世界”为己任,又在“改变世界”中不断获得自身的发展。这个“世界”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有机统一,这不仅是因为两个世界都遵循着同样的发展规律,而且改造两个世界的结果并不矛盾,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基本历史事实,“这个事实是我们理论思维的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22]也是中国价值不断开拓创新的以意志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实践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不断地趋向未来是其不变的誓言。中国价值一经形成,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要影响现在,更要引领未来,因而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实践永无止境,中国价值的创新发展也永无尽头。只有通过不断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国价值才能不断地获得生机活力。

首先,以价值观自觉为前提。推动中国价值的跨文化交往,必须坚持价值观自信,而价值观自信以价值观自觉为必要前提。只有价值观自觉,才能知道中国价值从何处来、现在处于何处、又将走向何方。

价值观自觉是在不同价值观的交流互鉴中形成的,是比较的结果,而价值观自觉实际上就是文化自觉。关于文化自觉,费孝通有比较完整而深刻的论述。在费孝通看来,所谓文化自觉,就是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既知晓其过去、现在,也能明确把握其未来的发展趋向,既知其所长,也知其所短,做到扬长避短。那么,如何做到文化自觉呢?费孝通认为,这是一个艰巨、艰难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23]总之,文化交流互鉴是达致文化自觉的基本道路。也只有通过交流互鉴,在比较与融合中知道自己文化的长短、优劣,才能做到文化自觉。也就是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以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交流互鉴为存在的基本样式,道理很简单:没有哪一种价值观敢妄称自己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它必须在与不同价值观的交流互鉴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提升空间。因此,只有正确对待不同的价值观,在相互交流中省察自身,才能不断地提升自我,并在时代变幻中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在这方面,沈清松的“跨文化哲学”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沈清松主张从“对比”延伸到“外推”,建议主体从“存在自觉”走向“多元他者”,以期达到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双向互推、主动自

觉的目的。^[24]其实,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倡导从“外推”到“对比”,让主体从“多元他者”走向“存在自觉”。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路径。中国价值可以通过“外推”进入“多元他者”,进行平等的“对比”。“对比”不是比优劣、分高下,而是相互发现、取长补短、各取所需。因此,从“对比”哲学出发理解中国价值自觉,意味着一种平和冷静的文化心态。中国价值不是一个固定化的模式,而是一个不断探索并创新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借鉴吸收“多元他者”之所长,正是中国价值成熟的标志。当然,价值观自觉又以价值观自信为前提。进行“对比”,不是妄自菲薄甚至迷失“本我”,而是通过互学互鉴,在强基固本的同时,推动不同价值观的共生共融、共同发展。

其次,以价值理性为引导。价值理性是一种基于价值思考的价值观自觉。中国价值在跨文化交往过程中,要始终秉持初心: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构建人的精神家园。

价值理性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一个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的概念,也称实质理性,其主要特征是注重行为本身的价值,至于行为的方式与结果,则可以忽略不计。虽然这一理念具有无法克服的严重局限性,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核心元素或精髓——强调人类要坚守超越性的价值理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当然,我们不应该一味“跟着”韦伯的话语,而是应该从现实生活出发,在借鉴吸收其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对价值理性进行重新阐释,可以将其看作一种价值观自觉:以目标的设定为首要原则,不仅赋予目标以实质内容和价值取向,而且强调行为方式和结果的合理性、正当性,从而展陈出既定价值目标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在这个意义上,价值理性源于人类的终极关怀。

中国价值是一种目的理性,它从一开始就设定了明确而远大的目标,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中国价值不仅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存在,也是为了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存在,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发展和实现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权益,实现“每一个人的发展”。要实现“每一个人的发展”,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是:中国价值必须从根本上体现人类的共同利益。正因为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不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还是一个价值共同体。要做到这一点,与世界不同价值观的交流互鉴就成为不可缺少的基本进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根据唯物史观的理解,利益都是一定主体的利益,没有主体的利益是不存在的。不同主体的利益是有差异的,只有在相互交往中,才能发现异同,才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实现共赢。

再次,以回归生活为路径。在价值取向上,如果说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价值的终极理想,那么,日常生活则是中国价值根植的深厚土壤。中国价值只有深深地扎进日常生活之中,才能向理想生长、向未来生长。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具有世界性。

在唯物史观中,人的全面发展以日常生活为根基。日常生活不仅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人创造历史和发展自身的现实基础和前提条件,是一定价值观的生活化。因而,价值观必须体现人的日常生活,并落实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一方面,任何一种价值观的产生和发展都以现实生活为深刻根基。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存在,价值观只能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之上,或者说,日常生活中的观念、习俗、传统等必然上升为价值观,在引领或塑造共同体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沉淀、凝聚为一种共同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价值活动。实际上,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列斐伏尔等人看来,日常生活从来都是围绕着文化价值这个轴心展开的。另一方面,价值观的作用不是体现在理论上,而是体现在实践中。只有融入社会生活之中,让人们在实践中感受它的温度、力度、厚度、深度,价值观才能真正推动和引领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更多的是一个符号世界而非一个意义世界,其“存有意义是主体的构造,是经验的,前科学的生活的成果”,^[25]它可以提升为一个意义世界,也可以沉沦为一个欲望世界,而这正是价值观关注的视域或焦点。

实际上,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演绎,日常生活的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人们的日常生活如物质消费、文化消费等,已经或正在全球化,全球性消费已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行为。另一方面,网络生活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网络生活是没有国界的。在全球化时代,日常生活已经具有了跨文化的意义。因而,中国价值通过跨文化活动实现创新发展,必须把根深深地扎在日常生活之中。这有两方面涵义:一是日常生活是中国价值生长的土壤。如果说,在过往的历史中,中国价值根植于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之中,那么,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程中,中国价值亦应根植于世界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有如此,中国价值才能日益呈现出一种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二是只有扎根于世界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才能不断地汲取各种文化的有益营养,更容易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所了解、理解、认同和接受,从而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中国价值的形象。

最后,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依归。中国价值跨文化活动的目的,既在于跨文化,不断创新发展自身,也在于跨文化传播,促进不同价值观的繁荣发展、和合共生。所以,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价值矢志不渝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中国价值是当代中国人民的价值观。由于中国价值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因而,它必然以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这是中国价值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也是中国价值的“天命”：“以变而在的方法之所以可以成为天命的证词,就是因为此种方法是一种应对万变之法,即能够容纳一切可能性的方法,因而不可能被解构。无法解构的存在方式就是天命。”^[26]“不可解构”即“以变而在”。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中国价值的独力所为,而是在跨文化交往中,中国价值与不同价值观交流、交锋、互鉴、融通,求同存异、共生共荣,共同熔铸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实现人类共同利益提供坚实的价值观基础。这样的中国价值是“不可解构”的。

注释: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

[2][26]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38、174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9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5][7][8][9][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286、187、538、55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4页。

[12][美]艾瑞克·克莱默、刘杨:《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5页。

[13][14]高德步:《中国价值》,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6页。

[15]万明华:《从中国先贤的为学之道管窥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演变与传承》,《文化软实力》2019年第4期。

[16]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17]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新青年》1916年第6期。

[18][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19][2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6、1083页。

[21]科学技术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1975—199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23]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24]沈清松:《跨文化哲学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25][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58页。

[责任编辑:刘毅]